

诸葛亮成才与襄阳隐士群体

漆 福 刚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湖北 襄樊 441050)

摘 要 诸葛亮隐居襄阳期间, 结识了一群隐士, 其中有隐居避乱, 养性全身、不肯仕宦者如司马徽、庞德公, 有隐居求学, 关心时事、后来出仕曹魏的徐庶、庞统等人。诸葛亮与他们交往, 深受影响, 其成才与襄阳隐士群体密切相关。

关键词 诸葛亮; 襄阳; 隐士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0487(2005)03—0022—04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Zhuge Liang 's Prominence and Xiangyang Hermit Community

QI Fu - gang

(Science and Research Division of Xiangf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angfan Hubei 441021 ,China)

Abstract While living in selusion in xiangyang ,Zhuge Liang got acquainted with a group of hermits . Among them were Sima Hui and Pang Degong who eluded theunrest society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through meditation and would rather not pursue official positions .There were also Xu Shu and Pang Tong etc . ,who seluded themselves for studying and were still concerned about current events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and flueneced deeply from them ,Zhuge Liang distinguished himself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Xiangfan hermit community .

Key words Zhuge Liang ;Xiangyang ;hermit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 194 年),十三岁的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为避战乱而离开山东老家,徙居襄阳。建安二年(公元 197 年),诸葛玄去世,诸葛亮迁居隆中,在这里过了十年隐居生活,直至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他应刘备之邀出佐刘氏。其时诸葛亮二十七岁。这十年是诸葛亮人生的重要时期,是他对世界、人生、社会形成独立认识的重要阶段。此

后诸葛亮陈《隆中对》,指点江山、佐治蜀国等行为无不得益于这段隐居生活。而他这段生活中最亮丽、对他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结交的一批隐士,姑称之为襄阳隐士群体。

诸葛玄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故投奔襄阳。刘表治下的荆州,在当时是一块安定的绿洲,不仅社会稳定,而且经济基础雄厚,形成了“南收五岭,北据汉

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①的局面。这吸引了大批士人来此避乱。刘表为宗室近支,曾受学于王畅,被号为“八友”^②之一,列名党籍。可以说,刘表是有志于天下的儒士,故在他控制荆州局势后,即用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教育,发挥儒家的教化作用。《后汉书·刘表传》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镇西碑》云:‘武德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鼎彝,亲行乡射,柴路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士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数,洪生巨儒朝夕讲论,匍匐如也。’”刘表亲自行礼以示尊崇教育,这种姿态及其兴学措施促进了荆州文化的发展。学士还进一步把对于经典的讨论文本化,“使蔡母、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③。这必然进一步促进文化的传播。诸葛亮就有可能被安排在刘表所开设的“学业堂”中,继续因避乱迁徙而中断的学业。官学外还有私学。这造成了学人盛集、崇学重教的人文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士人们易通过交游找到志趣相投的师友结成群体。襄阳隐士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下简称本传)载:“(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崔州平是崔烈的儿子,他南走襄阳,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其父崔烈战死、其兄崔均病死后,即兴平(公元194—195年)年间。徐庶“少好任侠击剑”,后折节向学,听习经业,义理精熟。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④看来徐庶与石韬因为同郡同学而较早相识,并于初平中避乱襄阳,建安初与诸葛亮同游学并结为朋友。其中,诸葛亮与徐庶特相友善。同学者还有汝南孟公威。孟公威名孟建,后北归,仕于魏,其归乡时间不可考,疑在刘备屯新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前。徐庶和石韬在荆州被曹操攻破后回到北方,俱仕于曹魏,时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四人当年相若,时皆年青,且常相与谈论时事、未来志向。诸葛亮的小姐夫庞山民此时也闲居在家,后仕于曹魏,还有与诸葛亮年龄相差不远的庞统。

诸葛亮与崔州平诸人一起读书,除谈学吟诗外,还谈论志向时局、评价人物,抒发胸襟怀抱。据《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颍川石

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⑤本传载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徐庶、崔州平“谓为信然”;若非深交且常谈彼此志向,绝难做到如此知己知彼;而自度己才,预测他人仕宦,说明诸人都曾就世事谈论看法,谈及将来去向和仕途。在这种交往中,彼此直抒己见,直陈时弊,交流对历史和时事等的看法,无疑拓宽了视野。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朋友有助于帮助认识自己和加强修身。诸葛亮在《又与群下教》中指出:“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可见青年朋友间互相帮助,无疑有助于个人的成才。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可见诸人皆有仕宦的意向,只是诸葛亮在对全局做出分析后,认为大丈夫若要伸展才志,不必去“饶士大夫”的地方,这样才有利于大展宏图。由此看来,这批年轻士人隐居是为了避乱、求学,并观察时局,伺机出仕,可谓隐士群体中的隐以待时者。隐士群体中有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司马德操和庞德公。《三国志·庞统传》云:“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世说新语·言语》:“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则庞统弱冠时曾往颍川见司马徽。又据前二书注引《襄阳记》,庞统年十八,庞德公使其往见德操。可见庞统为从父庞德公所知,庞德公更希望他去见品评名家司马徽以致盛誉。若据《通鉴》,庞统卒时年三十六,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则十八岁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弱冠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若据《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华阳国志》,庞统卒时年三十八,则十八岁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弱冠是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疑庞统去颍川见司马徽是在建安元年。而刘备在新野访世事于司马徽是在建安六年,则司马徽从颍川迁居襄阳在建安元年至六年之间,且在建安六年前已与诸葛亮、庞统结识并对他们有相当了解,推二人为“识时务者”^⑥。

据《水经·沔水注》载:“襄阳城东有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清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庞)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世故

谓是地为白沙曲矣。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薜裳,率尔休畅,岂待还挂柁于千里,贡深心于永思哉!”可见司马徽在襄阳的故宅与庞德公、庞士元隔水相望,且三人颇为相得,纵情山水,疑司马徽乃择近庞德公处而居。庞德公于《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有传,为襄阳南郡人,未尝入城市。司马徽“年少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甚至可登堂入室,呼妻役子,足见他们关系十分密切。^⑦

据《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谈。”看来司马徽与徐庶、庞德公经常聚谈,且时常有外人加入。其谈论内容很可能有人物品鉴、时局评论、经典大义等。司马徽是古文经学家,曾开门授徒,诸葛亮可能曾受学于他。庞德公称诸葛亮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说明他对主人才识颇为了解。司马徽对刘备云:“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⑧司马徽推荐伏龙(徐庶向刘备荐称诸葛亮为卧龙)、凤雏,并以为二人识时务,表明他认同庞德公对二人的品评,很可能这种品评即是在互相谈论时得出的;并且诸葛亮等人对于时事有相当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必待交谈而为他人认同,并在交谈中加深。诸人中以庞德公最为年长,诸葛亮“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⑨说明诸葛亮对庞德公特别尊敬。有的研究者认为诸葛亮独拜庞德公是为取得庞公的好评,为步入仕途铺路。当然,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纯粹如此解释,也未免偏颇。何以诸葛亮不拜司马德操呢?庞德公子山民妻为诸葛亮的小姊,因姻亲关系而示尊敬也是可能的。

庞公和司马徽二人是当时襄阳最有名的隐者。《后汉书·庞公传》载有刘表屈身去见庞公时二人对话。为便于分析,兹摘抄于下:

(刘表)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鼯鼯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

据庞公意,人依性分为自己选择一安全去所,想保全性命,天下不是自己想保全的对象;为官禄则有危相随,居畎亩则平安度日——其意最终在保全性

命,看来庞公深谙保全之方,以后他携家采药躬耕于鹿门山中,更是择地而隐了,疑是有感于战乱将至之举。

司马徽与庞士元的对话和上引庞公与刘表之间的对话颇相似。庞统以为“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司马徽指责他“适知邪道之速,不虑失道之迷”。他在蔑视权贵、以官场为祸乱之地这一点上看法与庞公一致。司马徽“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⑩因此刘表不相信他为奇士,认为他不过是小书生。可见他善自韬晦。及至刘备屯新野,访世事、人物于他,他又力荐诸葛亮与庞统,由此知司马徽于世事并非毫不关心,只是择人而事。他实是有所待的:待明主贤才,但又甘于贫贱,视富贵如浮云,勤事耕桑。及曹操欲用之,适逢其病卒。他待人宽厚仁善,必能教化乡俗。此二位长者居贫而善洞察世事,终不肯出仕,是隐士群体中与年轻一辈不同的另一种人:隐居避乱、养性全身者。诸葛亮在与他们长期交往中,必然深受其影响。

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也是值得一提的。《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他以丑女才堪配孔明而荐亲。女既有才,且又识女之才堪配卧龙,则身为沔南名士的黄承彦绝非一般人物。史无他与庞德公、司马德操结交的记载,然同为名士,居址相近,又有大家都熟知的人,其交往当是较密切的。黄承彦无仕宦记载,或为隐者,则似亦可作为此隐士群体之一员。

就诸葛亮而言,他显然是有出仕刘表的机会和条件的。首先,他随叔父诸葛玄千里投奔刘表,刘表素称宽厚好士,诸葛玄去世后,诸葛亮若想从宦,刘表该不会拒绝。其次,诸葛亮一家与襄阳的一些名门大族有联系,这奠定了其社会地位。这些大族是刘表政权的重要支柱,若诸葛亮想入仕,凭借这些社会关系,当不是难事。《襄阳耆旧记》载:“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即蔡瑁的两个姐姐分别是诸葛亮的岳母和刘表后妻。同书又载:“(蒯)欽从祖祺妇,即诸葛亮孔明之大姊也。”蒯欽是西晋时人蒯祺之侄孙,蒯祺大概是蒯越的儿子或侄儿。蔡瑁和蒯越是刘表初至荆州时帮助他平息内部宗贼反乱稳定局势的重要人物,是很有势力的襄阳大族蔡氏和蒯氏的代表人物。

其他如马氏、向氏与诸葛亮是互有联系的,与杨氏、习氏的直接交往虽无史料记载,然接触应是难免的。仅凭蔡氏、蒯氏的影响,诸葛亮入仕应该不成问题。^①再次,据前可知,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夫,且诸葛亮与刘表之子刘琮、刘琦是同辈人。《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多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这表明诸葛亮与刘氏来往密切,且深受刘琦信任。若此,只要诸葛亮表现出入仕之意,刘氏当是欢迎的。加上他受名士庞德公、司马徽赏识,只要他们向刘表推荐,应也是有影响的。有以上种种便利条件,诸葛亮却没有入仕,这恐怕只能从他自身去找原因了。然他受二位长者影响,学会等待时机,以便择主而仕。或许正因与豪族、刘氏家庭有较多来往,明了内部情况,知刘表不足辅佐;又受隐士群体谈论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故未仕刘表。

应该说,诸葛亮的成才大大得益于襄阳隐士群体。正是在那种文化环境下,在与襄阳隐士的交往

中,造就出诸葛亮那样的雄才。其《隆中对》很可能即是襄阳隐士群体诸人平日互相交流看法逐步形成,而由诸葛亮整理作为给刘备的见面礼,由此他深受刘备赏识,得到重用,从而成就一番伟业。

注释:

①②(晋)陈寿《三国志·刘表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刘表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642页。

④⑤⑥(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921-924页、第926页、第928页。

⑦⑧⑩(晋)陈寿《三国志·庞统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第959页。

⑨⑪魏平柱《试论诸葛亮的隆中之“隐”》,《襄樊论坛》,1998年第5期。

审稿:王乾光

(上接第12页)尽管如此,历史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本文旨在通过已有的史料考查庚款兴学与中国早期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将我国早期科学教育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庚款兴学,对历史事件作用的夸大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要予以说明的。

注释:

①美国教育家孟禄和推士(G. P. Twiss)于20世纪20年代相继来中国考察,他们都认为,中国科学教育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教育设备落后,师资匮乏。参见舒新城编《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278—280页。

②③(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8页。

④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

⑤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338页。

⑥⑦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3页、第172页。

⑧⑨转引自黄利群《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文集》,白山出版社,2003年第78页、第209-211页。

⑩黄利群《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文集》,白山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⑪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⑫转引自杜成宪,丁钢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

审稿:王欣登